

〔美〕 威尔·杜兰特 著

朱 安 武国强

周兴亚 等译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Simon & Schuster, Inc. 1961

探索的思想 ①

· 思想者书系 ·

文化艺术出版社

探索的思想

——哲学的故事
(下册)

〔美〕威尔·杜兰特 著
朱 安 武国强 周兴亚 等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探索的思想——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 根据
Simon & Schuster, Inc. 1961年版 (1967年第28次印刷) 译出

责任编辑: 蒋爱虹

封面设计: 滕大千

探 索 的 思 想
——哲学的故事(上、下册)

[美] 威尔·杜兰特 著

朱 安 武国强 周兴亚 等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5 字数431,000 插页2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7,000—12,000册

ISBN 7-5039-0651-7/B·4

定 价: 25.60 元



第六章

伊曼纽尔·康德 与德国唯心主义

一、通向康德的道路

在十九世纪思想界，还没有哪种思想体系像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那样雄踞过整个时代。世界在沉寂了六十年之后，终于被柯尼斯堡^①的那位苏格兰人于1781年以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唤醒。从此以后，“批判哲学”始终主宰着欧洲思想界。叔本华哲学乘着1848年的浪漫主义思潮曾经昙花一现；1859年后，进化论扫除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随着十九世纪接近尾声，尼采以其振奋人心的捣毁偶像运动占领了哲学舞台的中心。但这些都是次要、表面的发展，在它的下面，康德思潮那股强劲而持久的急流奔腾不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博大精深。时至今日，其基本理论仍是所有成熟哲学的原理。尼采接受了康德哲学，并

^① 即现今苏联的加里宁格勒，歌德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译注。

将它传诸后人；叔本华则称《批判》是“德语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不懂康德，就说明一个人还没有成熟；斯宾塞不能理解康德，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学说未能完全达到哲学的高度。用黑格尔评论斯宾诺莎的话来说：要成为哲学家，首先要成为康德主义者。

因此，让我们赶快成为康德主义者吧。但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在哲学中，亦如在政治中，直线反而是两点间最长的距离。要了解康德，就不该先急于读他的作品。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与耶和華相比，既像又不像。他透过云层讲话，但却没有雷鸣闪电来照亮他的思想。他不屑举例，不屑触及具体事物，因为那样会使他的著作冗长不堪。（经过这样的缩略后，他的著作还剩下大约八百页。）只有职业哲学家才能读懂他的书，因为这些人不需要任何举例说明。然而，当康德把《批判》手稿交给他的朋友赫茨——一个深于思辨的人——阅读时，他才读了一半就完璧奉还了，要是再接着读，他说自己恐怕就得发疯了。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家，我们如何是好？

让我们以迂回的方式谨慎地去靠近他，开始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让我们从圆周上的各点着手，然后慢慢向中心摸索，那里埋藏着康德哲学最深奥、最宝贵的财富。

1. 从伏尔泰到康德

这是一条从没有宗教信仰的理论理性到没有理论理性的宗教信仰的道路。伏尔泰意味着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和理性时代。弗朗西斯·培根笃信科学和逻辑的力量最终将解决一切问题，并证明人类“可以无限地臻于完善”。他的这一热情激发了整个欧洲（卢梭除外）的理想。孔多塞^①在狱中写成《人类精神进步史》

① Condorcet, Marguis de(1743—1794)，法国数学家、革命家、哲学家，他关于人类能够无限地完善自身的进步观念对十九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具有极大影响——译注。

(*Historical Tablean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Spirit*) (1793)一书,表达了十八世纪对知识和理性的崇尚,并把普及教育视为通向乌托邦的唯一途径。甚至在较沉稳的德国人中,也出现了自己的启蒙运动、自己的唯理论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弗^①以及大有希望的莱辛^②。法国大革命中群情激昂的巴黎市民们通过崇拜由一个迷人的街头女郎装扮的“理性女神”,把这种神化了的理智戏剧化了。

在斯宾诺莎那里,对理性的信仰繁衍出一套几何学和逻辑学的宏大结构: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可以通过对已知原理的推论,纯粹以演绎的方法先验地对它进行描述。在霍布斯那里,培根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从斯宾诺莎到狄德罗,一往无前的理性所到之处,宗教信仰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颓壁残垣;旧的信条逐个消失;代表着中世纪信仰的哥特式大教堂连同它赏心悦目的奇异艺术风格一起崩溃了;古老的上帝随同波旁王朝一起被人从宝座上拉了下来;天国隐没了,留下的只是一片晴空,而地狱仅仅变成某种感情的表示。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法国沙龙中把无神论打扮得如此时髦,以致连教士们对它也趋之若鹜了;而拉美特利则在普鲁士国王的赞助下,把它带到德国四处兜售。1784年,莱辛宣称自己是斯宾诺莎的信徒从而使雅可比^③震惊,这表明,宗教信仰正处于最低点,而理性则在高歌凯旋。

在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口诛笔伐中起过振聋发聩作用的大卫·休谟说,当理性与人相悖时,人很快就会与理性作对。欧洲

① C·Wolff(1679—1754),德国哲学家、科学家、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其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唯理论和数学方法论——译注。

② G·E·Lessing(1729—1781),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也是哲学家和美学家——译注。

③ F·H·Jacobi(1743—1819),德国哲学家,是对斯宾诺莎的唯理论进行批判的著名哲学人物——译注。

大地上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个教堂尖顶所体现的宗教信仰和希望，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机构和人们的心目之中，它们不会轻易地在理性的敌对裁决面前低头认输。这种信仰和希望，在遭到判罪之际，会不可避免地对法官的资格提出诘难，并要求除对宗教进行审判之外，也要对理性进行审判。这种用演绎推理就打算置拥有千百年历史和千百万追随者的信仰于死地的理智是什么？它就不会犯错误吗？要不，它就和人类的其他器官一样，在功能和力量上也有自己严格的极限吧？现在，作出最终判决、并对这位把一切古老希望都施以极刑的无情法官进行审查的时机已经成熟。

2. 从洛克到康德

洛克、贝克莱以及休谟的著作为这一审查铺平了道路，然而，结果显然对宗教充满了敌意。

约翰·洛克（1632—1704）提出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法用于心理学；在他的力作《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1689）中，理性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转向自身，而哲学则开始审视其信赖已久的工具。这种哲学上的内省趋势与理查森^①和卢梭的内省型小说并驾齐驱；正如《克拉丽莎·哈洛》和《新爱洛绮丝》^②中的伤感情调与哲学中崇尚本能和情感、贬抑理智和理性的趋向遥相呼应一样。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是否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先于一切经验，生来就具备诸如是非、上帝的观念呢？焦虑的神学家们担心人们由于未能在望远镜中发现上帝而失去对神的信仰，便认为如果能够说明信仰和伦理道德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念是每个正常人与生俱来的，那么，二者就有

① S·Richardson（1689—1761），英国小说家，其《帕美勒》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用书信体揭示人物内心活动——译注。

② 这两本小说分别为理查森和卢梭所著——译注。

可能得以巩固。然而，洛克却不能接受这些推测，尽管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并随时准备为“基督教的合理性”做出滔滔雄辩。他平静地宣称一切知识来自经验，而且是通过感官获得的——“除非先在感观里，否则心里什么也不会有。”人在出生时，心是一块干净的白板，a *tabula rasa*（一块白板）；感觉经验以一千种方式在上面书写，直到感觉萌生记忆，记忆再生发观念。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引向这一惊人的结论：既然只有物质能够影响我们的感官，那么除了物质，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就必须接受唯物主义哲学。如果感觉是思想的原料，性急的人争辩说，物质一定就是精神的材料了。

乔治·贝克莱主教(1684—1753)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他觉得洛克对认识的分析无非是在证明物质只是精神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并不存在。通过表明我们并不知道物质为何物这种简便的方式来反驳唯物主义，这倒不失为一个绝妙的主意；在欧洲，唯有盖尔人的想象^①才能构想出这些玄学魔术。这位主教说：然而，一切是多么明显，洛克不是说过我们的全部认识都来自感觉吗？因此，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不过是对其的感觉以及从这些感觉中得到的观念罢了。一个“事物”只是一大堆知觉而已——即，经过分类和选择的知觉。你会反驳说你的早餐远比一大堆知觉来得真实、牢靠；通过你的拇指教会你干木工活的铁锤所具有的物质性就更加可观了。然而，你的早餐开始仅仅是一堆视觉、嗅觉和触觉，接着便是味觉，然后又是内心的舒适、温暖的感觉。同样，铁锤也是一堆颜色、大小、形状、重量、触觉等感觉，这把铁锤对你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它可能一直敲着你失去知觉的拇指而得不到你的丝毫注意。它只是一大堆感觉或记忆，是一种精神状况。就我们所知，一切物质都是一种内心状况；我们直接了解的

① 贝克莱是盖尔人，故称“盖尔人的想象”(Gaelic imagination)——译注。

唯一实在就是精神。关于唯物主义，就谈到这里。

然而，这位爱尔兰主教却没有把那位苏格兰怀疑主义者考虑进去。大卫·休谟(1711—1776)二十六岁时以其充满异端邪说的《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近代哲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和奇迹——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们认识精神，休谟说，和我们认识物质一样：通过感觉，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是通过内心的感觉。我们不会觉察到诸如“精神”这样的实体；我们觉察到的只是个别的观念、记忆、感情等等。精神不是一种物质，不是一种具有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称；感觉、记忆和感情，它们的总体才是精神，思维过程的背后并无任何“灵魂”。结果似乎是，正如贝克莱有效地消灭了物质那样，休谟也有效地消灭了精神。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哲学陷于自己造成的一片废墟之中。难怪有位才子在奉劝众人放弃这种争议时说：“没有关系，不必介意。”^①

但是，休谟并不满足于从驱逐灵魂的观念来摧毁正统宗教；他还立志打破规律的概念以摧毁科学。自布鲁诺和伽利略以来，科学和哲学一样，都大谈自然规律，大谈因果关联中的“必然性”；斯宾诺莎就在这个值得骄傲的构想上建立起自己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注意，休谟说道，我们觉察不到原因或规律；我们觉察到的是事件和关联，从中推断出因果性和自然性；规律不是事件所必须服从的永恒、必然的法则，而是人们对各种眼花缭乱的体验所作的主观概括和浓缩；我们不能保证迄今观察到的各种关联会在未来的经历中一成不变地再现。“规律”是一种人们在看待事情的关联时遵守的习俗；然而，习惯中是没有“必然性”的。

只有数学公式具有必然性——唯有它们是真实的，不会改变的。这是因为这类公式属于同义反复——谓语的内容已经包含在

① No matter, never mind. 双关语，字面意思：“没有物质，没有精神。”——译注。

主语之中；“ $3 \times 3 = 9$ ”是一个永恒的、必然的真理，因为“ 3×3 ”与“9”是一回事，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谓语没有为主语增添任何东西。因此，科学必须严格局限于数学和直接实验之内，而不能信赖从“规律”中得来的未经验证的推断。“当我们接受了这些原则，穷尽一座又一座图书馆时”，我们这位可怕的怀疑论者写道，“我们一定会造成巨大浩劫！例如，我们拿起一本形而上学课本时，让我们问一问：‘它是否包含有关量和数的抽象推理呢？’没有。‘它是否包含有关事实和存在的实验性推理呢？’没有。那么，就付之一炬吧，因为它包含的只是诡辩和错觉罢了。”

不难想象，这些言论对正统派来说是多么刺耳。在这里，认识论的传统——对知识的性质、来源和正确性的研究——已不再是宗教的支柱；贝克莱主教用于宰杀唯物主义这条巨龙的利剑反过来对准了非物质的精神和不朽的灵魂了；在这场混战中，科学自身也遭到了巨创。难怪康德在1775年翻阅德文版的大卫·休谟的著作时，被这些结论所震惊，并且，像他所说的那样，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被唤醒了。在这场昏睡中，他认为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都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和信仰就要在这位怀疑主义者面前缴械投降吗？怎样才能拯救它们呢？

3. 从卢梭到康德

对于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关于理性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论点，贝克莱试图以物质并不存在作为回答。不过这使得休谟反驳说，由于同样原因，精神也不存在。另一种答案也是可能的——理性并不是最后的检验标准。有些理论上的结论是与我们的整个身心相悖的；我们没有权力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本性中的这些要求应遭到某种逻辑的扼杀，而这种逻辑只不过是我們自己新近创立的、脆弱的、具有欺骗性的东西。我们的本能和感情把想要我们

的一举一动都像几何图形一样规则、并具有数学精确性的那种推理演绎弃置一旁的事，实属屡见不鲜！毫无疑问，有时——特别在杂然纷呈、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中——理性是更好的向导；但是当面临生活中的重大危机，并涉及到行为准则和信仰这些重大问题时，我们信赖的是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我们的图表。如果理性与宗教相悖，理性只会更糟糕。

实际上，这就是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论点。在法国，他单枪匹马地与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奋力抗衡。一个纤弱而敏思的人陷入了粗野的理性主义和百科全书派近乎疯狂的享乐主义^①的包围之中，他的命运会有多么不幸！卢梭年轻时就病魔缠身，羸弱的体格以及父母、师长的冷漠养成了他沉思、内向的性格；他从荆棘丛生的现实逃遁到梦幻的温室世界中，在那里，生活和爱情方面未能获得的胜利可以在想象中得到补偿。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表明了纯真的情感与隐秘的体面、荣誉感之间难以调和的情结，并且通过这一切表明了他自己在道德上处于优越地位这一坚定信念。

1749年，第戎学院进行了一次有关“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有助于道德的败坏还是净化？”的有奖征文活动，卢梭的文章获奖。文化的恶大于善——他就像一个在发现对文化的探讨非自己的能力所及以后，便一门心思要证明文化毫无价值的人那样争辩说。想一想印刷术在欧洲引起的那些可怕的混乱吧。哪里出现哲学，那个国家的道德素质就会腐败。“自从有了学者，诚实的人便无处可寻，这甚至成了哲学家们自己流传的一句名言”。“我敢冒昧地说，沉思与人的本性格格不入；一个会思索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堕落了动物”。摒弃过于发达的理智而转向内心和感情的训练，那会更好。教育造就不出完美的

^① 享乐主义(Hedonism)认为寻求快乐是一切行为的动机。

人；它只能使人聪明——通常是为了使坏。本能和感情要比理智更为可靠。

在名著《新爱洛绮丝》(*La Nouvelle Heloise*) (1761) 中，卢梭不惜笔墨地褒颂感情，诋毁理智；善感在贵妇，甚至在部分男子中间成了一种时尚；整整一个世纪，法国先是浸泡在文学泪水中，后来，文学泪水被真正的眼泪所代替；十八世纪伟大的欧洲理性运动终于在1789至1848年间的浪漫文学面前让路。这种趋势夹带着强大的宗教感情复苏；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1802) 中的欢欣完全是卢梭的教育论文《爱弥尔》(*Emile*) (1762) 中“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呼应。“自白”的论点概要如下：理智可能与信仰上帝和不朽产生抵触，但感情却对二者极为有利；我们为什么不信赖自己的本能而屈服于干瘪的怀疑主义的绝望呢？

当康德读到《爱弥尔》时，为了一口气看完，他放弃了每天菩提树荫下的散步。发现另一个人人在冲破无神论的黑暗，并就感觉论问题大胆地强调感情优于理论理性，是康德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反宗教信仰的另一半答案，现在，一切嘲笑者和怀疑者将被驱散。把各种论点汇集在一起，将贝克莱和休谟的观点与卢梭的感情相结合，从理性中拯救宗教，同时又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这就是伊曼纽尔·康德的使命。

然而，伊曼纽尔·康德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二、康德其人

1724年，康德生于普鲁士的柯尼斯堡。除了在邻村当过一阵教师以外，这位酷爱讲授异域地理和人类学的身材矮小、性情温和的教授从未离开过出身地。他生于贫困家庭。祖辈在他出生的几百年前从苏格兰迁至德国。他的母亲是虔敬派教徒——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成员与英国卫理公会教徒一样，坚信严格

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从早到晚都处于宗教环境之中，以至在成年，他一方面对教堂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特色，并且，当他进入老年时，热切期望为世人及自己保持母亲在他心中深深印下的信仰本质。

但是，一个在腓特烈和伏尔泰时代长成的年轻人不可能与当时的怀疑论思潮毫无关联。康德深受一些人的影响，后来，他又奋起驳斥他们，对他影响最大的可算是康德后来最爱攻击的休谟；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位哲学家超越了他成熟期的保守主义，并当年近七旬时，在最后的著作中，几乎转向了激进的自由主义，要不是因为他的年纪和名望，这一举动几乎断送他的一切。甚至在他的有关宗教复苏的论著中，我们也会常常惊奇地听到另一个康德的声音，稍不留神，就会把他当成伏尔泰。叔本华认为“让康德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理论、甚至敢于出版《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这全然不是腓特烈大帝应有的美德。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会让一个带薪的教授”(即德国的政府雇员)“有如此冒昧之举。康德曾对国王的继位者保证过他不会再写任何东西”。出于对这种自由的感激，康德把《批判》题赠给塞德立茨，腓特烈大帝的一位富有远见和进步观点的教育部长。

1755年，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担任讲师。他在这低微的职位上一直呆了十五年：两次要求提升教授的申请都被拒绝。直到1770年，他才出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教育学教材，他常说这本书中有他从未使用过的精妙方法。然而，他教学要比写书更在行；两代学生都很爱戴他。他奉行的规则之一就是尽力帮助那些中等智力的学生；他认为，低能儿实属不可救药，而那些天才则完全能够自理。

无人料想他会以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轰动世界，对这位腼腆、谦逊的教授来说，去惊动某人似乎绝不可能。他自己也没有

朝那方面想过；在四十二岁时，他写道：“我有幸迷上了形而上学；可它对我的垂青至今还少得可怜。”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正处于“形而上学的无底深渊”，“形而上学犹如没有边际、没有灯塔的黑色海洋，堆满了哲学的沉船”。他甚至还抨击形而上学学者，并说他们好比身居思维高塔，“在那里，常常是狂风大作”。他根本没有预料到最强烈的形而上学狂魔将会出自他自己。

在这些平静的年月里，他的主要兴趣是物理而不是形而上学。他撰文研究星体、地震、火、风、乙醚、火山、地理、人种学以及其他上百种类似的课题，这些往往不具备形而上学的色彩。他在《天体理论》(*Theory of the Heavens*)(1755)中倡导的内容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极为相似，试图对天体运动作出机械的解释。在康德看来，所有行星都已经或将会有人居住，那些离恒星最远的行星，由于形成期最长，可能存在着比地球人类具有更高智能的有机体物种。他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于1798年从他毕生的讲稿中编订而成)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康德声称，在人类受野兽主宰的早期，婴儿出世时若像现代人一样哇哇啼哭，就会被猛兽发觉、吞食；所以，很可能早期的人与现代文明之中的人差异极大。接着，话题又转向细微方面：“自然是如何导致这种变化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我们不得而知。这一问题长期伴随着我们。他暗示着以下说法，即便现在，若发生某种巨大的物理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阶段，那时，猩猩用于走路、触摸和发声的器官也将演变成完整的人的结构，同时具备一个专司理解的中心器官，它们将在社会制度的训导下日趋发达。”这儿的将来时是否就是康德提示人如何源于动物这一理论时而采取的谨慎、间接的方式？

至此，我们对康德的缓慢成长过程已稍有所了解。他身材矮小，还不到五呎，谦逊、谨慎，但他的头脑中蕴藏并产生了近代哲学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革命。康德的生活，他的传记者写道，

犹如规则动词中那些最规则的动词。“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海涅说，“各有其固定时间。每当伊曼纽尔·康德身着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向现仍称为‘哲学家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悠然走去的时候，邻居们就知道时针准是指向三点半。他如此来回踱步，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当天气阴沉或乌云密布时，人们就会看到他的老仆人兰佩夹着一把大伞，焦急地跟在他身后，仿佛是谨慎的象征。”

由于体格虚弱，康德不得不采取严格的措施保养身心；他觉得没有医生反而更好；因此，他一直活到八十高龄。在七十岁时，他写下了一篇短文《论通过坚定意志的精神力量控制病感》(On the Power of the Mind to Master The Feeling of Illness by Force of Resolution)。他最赞赏的方式之一就是只用鼻子呼吸，在室外尤为如此；因此，无论是秋天、冬天还是春天，他在散步时不允许任何人与他说话，保持沉默总要比患感冒强。他甚至把哲学用在系袜子的方法上——把袜带吊在裤兜中小匣子里的弹簧上。他每做一件事，总要考虑再三，因而终身未娶。他曾两次想对女人求爱，由于他过于踌躇，第一位女友与一个更有勇气的男人成了家，另一位在我们这位哲学家下定决心之前就搬离了柯尼斯堡。也许，他和尼采一样，认为婚姻会妨碍对真理的虔诚追求；“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塔列朗^①常说，“会不顾一切地去挣钱”。康德二十二岁时就以一个青年的满腔热忱写道：“我早已致力于我决心保持的东西。我将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什么也无法阻止我对它的追求。”

就这样，在十五年内，他一如既往，饱尝了贫穷和卑微的滋味，对他的巨著进行规划、编写和修改，直到1781年他五十七岁时才全部完成。没有一人像他这般缓慢地走向成熟，同时，没有

^①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译注。

一本书像他的著作那样在哲学界掀起了如此惊涛骇浪。

三、《纯粹理性批判》

这个题目意味着什么？这儿的批判不是贬义的批评，而是评析；除了在该书的末尾指出“纯粹理性”的局限性以外，康德并未对它加以攻击；相反，他希望向读者显示“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使之凌驾于通过扭曲了的感官途径而获得的知识之上。“纯粹”理性指并非来自感官、而是独立于感官知觉的知识，它是我们的精神所固有的属性和结构。

一开始，康德便向洛克和英国学派发出挑战：知识并不完全来自感知。休谟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灵魂、科学并不存在；我们的精神只不过是一系列相关的观念；必然性也只是随时可能变化的可能性而已。这些错误的结论，康德说，源于错误的前提：你认为一切知识来自“具体的、不同的”感觉。当然，这些感觉不会产生你自己觉得十分可靠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关联；你自然也无望“看见”你的灵魂，哪怕是用内心知觉的眼睛。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知识来自感觉、来自独立的、变化无常的外部世界，那么，它就不可能具备绝对的确定性。可是，如果我们的知识独立于感官经验，其真理性甚至在经验之前——先验地——就能被我们确定，那又会怎样呢？那么，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就成为可能，不是吗？到底有没有这种绝对科学呢？这就是第一部《批判》^①所探讨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一旦抛开物质和经验，我们凭借理性能有什么收获。”《批判》因此细致地分析思维、考察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剖析精神的先天结构。这，康德认为，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本课题。“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面面俱到；我力求做到

① 康德先后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里的“第一部《批判》”是指《纯粹理性批判》——译注。

消除一切悬而未决的、未找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生当立丰碑，死亦垂千古。大自然正是用这种功名心鞭策我们去不断创造。

《批判》很快进入正题。“经验不是获得认识的唯一途径。经验为我们提供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它因而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普遍真理；它只能激发我们渴求真理的理性，而不能使之满足。普遍真理具有内在的必然特性，不应依赖经验——有其自身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这就是说，无论后来的经验怎样，它们都应该是正确的，它们的正确性先于经验，是先验的正确。“在先验知识中，我们不依靠经验能取得多大的进展？要说明这一点，数学不失为极好的一例。”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立的；我们难以想象将来的经验会违背它。我们可能相信明日太阳会从西边“升起”，或者有一天在某个想象中的石棉世界中，火烧不着柴枝；可我们决不会相信二乘二不会等于四。这种真理的正确性先于经验；它们不依赖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经验。然而，我们从哪里能获得这种绝对和必然的特性呢？不可能是经验，因为它给我们的只是片面的感觉和事件，而它们的顺序将来也会发生变化^①。这些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精神的先天结构、来自我们精神活动的自然和必然的方式。因为，人的精神（康德的伟大主题终于在此露面了）并不是被动的蜡块，可以任凭经验和感觉给它打上绝对而变化无常的印记；它也不是一系列心理状态的抽象名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器官(organ)，能将感觉铸造、整理成为观念，使杂乱的经验化为有条理的思维。

1. 先验的感性论

为解答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即对精神的内在结构或思维的

① 激进经验主义(詹姆士、杜威等人)在这一点上也加入了论战，他们反对休谟和康德，认为经验不但能带来关联和顺序，而且还有知觉和事件。